

黑水城 M1·1296、M1·1298 号文书的缀合、考释 及相关问题研究

邱志诚

上世纪 90 年代初,黑水城发掘工作主持者李逸友出版发掘报告之一《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时,将发掘编号为 F1:W44、F1:W45 的两件文书归入“符占秘术”类^①,认为“属于占卜方面的文书”,具体说是占卜入门知识课本的习抄本^②。2008 年,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按收藏地重编 F1:W44、F1:W45 为 M1·1296、M1·1298 号^③,仍将其归为“符占秘术”类文书,并分别拟题为“卦书”、“庖牺画卦”。笔者考证发现,M1·1296、M1·1298 并不是符占文书抄本,并且这两件文书实际上是一个抄本的两个连续页,应该只给一个编号、一个题名,且正确定名应是“习抄元版《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残页”。

一、文书研究

M1·1296、M1·1298 均为抄本文书残页,尺幅大小分别为 13.4cm×17.1cm、12.9cm×16.7cm^④,竖行左起书写,小字双行夹注。两文书字迹相同,书写认真、稚拙。兹录文于后^⑤(标点为笔者所加):

M1·1296

1.始画八卦始分画乾、坤、艮、巽、坎、离、震、兑之入口造书契

2.刻木而书其侧,以为契券 以代结绳之政以更革□□结绳

3.为治之政事 三乾☰艮☶坎☵震☳

①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

②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64页。

③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616、1617页。又,为行文简便下文一律用此编号。

④尺幅数据是《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重新测定的尺寸,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09页)标注的尺寸分别是“165×130毫米”、“170×130毫米”。

⑤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09页)已对两文书作了录文,但有误录之处,如将 M1·1296 第 2-3 行小字注“以更革□□结绳为治之政事”误录为“以更带结绳为治之政事”、将 M1·1298 第 1 行小字注“出索引纪”误录为“出索引记”,等等。

4. ䷁坤䷁巽䷸离䷄兑䷹
5. 神农教耕出《史记》
6. 神农氏^{姓姜氏}以赭鞭草木^{用赭赤之竹}

M1·1298

1. 庖犧画卦出《索引·纪》
2. 庖犧氏^{有三皇象}有圣德^{有圣明之德}仰则
3. 观象于天^{仰而观形象于天}俯则观法
4. 于地^{俯而观法则于地}旁观鸟兽之文
5. 帝观飞禽^{走兽之文}与地之宜^{与土地之宜}近取诸
6. 身^{近而取则于一身}远取诸物^{远而取则于万物}

M1·1296、M1·1298(见图一)两件文书从字迹上看,应出一人之手。从残损形状看,应出同一抄本——M1·1296的Aa边与M1·1298的A'a'边重合,M1·1296的Bb边与M1·1298的B'b'边重合。由此推知Aa边、A'a'边应为装订线一侧,而这两件文书残页则是从该抄本上撕下来的。从抄写内容来看,M1·1298第1行小标题名《庖犧画卦》,M1·1296第3、4行所列卦名、卦象正是伏羲八卦,可见两文书内容相关;且以M1·1296第一句“始画八卦”承M1·1298最后一句“远取诸物”,文义毫无扞格,则不仅两文书内容相关,更可能为同一抄本相连之两页。

b a a' b'



图一:引自《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上述推断虽几可论定,但若找到 M1·1296、M1·1298 抄录之原文且二者原文相连贯,此说方可定成“铁案”。笔者遍检载籍,最后在日本延宝二年(1674)刊本《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下简称延宝本)找到了该文书残页抄录的内容(见图二)。



图二:引自《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①

显而易见,M1·1296、M1·1298 所抄者正《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中相连的两个半页,M1·1296 所抄内容在后,M1·1298 所抄内容在前。所以,M1·1296、M1·1298 是一个抄本的两个连续页,是一件文书,应该只给一个编号、一个题名。正确的定名应该是“习抄元版《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残页”,正确的分类应该是将之归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卷《仪礼、儒学与文史卷》“习抄类”文书。而且 M1·1296、M1·1298 中的缺字、误字也可据《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校订:M1·1296 第 1 行□处为“卦”字,第 2 行□□处为“上古”二字;亦可知其抄错之处:M1·1296 第 3 行坎卦卦象应为☵错作☶、震卦卦象应为☳错作☱,第 4 行兑卦卦象应为☱错作☳^②,第 6 行“以赭鞭草木”脱一“鞭”字,应为“以赭鞭鞭草木”;M1·1298 第 2 行小字注“右三皇象一人”应为“古三皇第一人”、第 5 行小字注“帝观飞禽走兽之文”之“帝”应为“旁”字。

同时,我们知道“黑城考古发掘所得的全部文书,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在同一坑位地层中出土的往往见有元代和北元纪年。有的文书上虽没有年款,从其格式和文字内容上与有纪年的文书相较,亦可准确断定其年代”,时间最早的是“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①(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 年,第 207 页。

②李逸友已指出这两件文书“抄写卦文有误。伏羲八卦的兑,应为☱,误作☳;震应为☳,误作☱;坎应为☵,误作☶”(《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 64 页)。但李指误复误:李言“兑应为☱,误作☳”,实际是误作☳;李言“震应为☳,误作☱”,实际是误作☱。

年)”,最晚的是“北元宣光元年(1371年)”^①。M1·1296、M1·1298文书残页虽无年款,但属1295-1371年间遗物无疑,则其所抄《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版本早日本延宝二年(1674)翻刻本300多年(实即延宝本的祖本,详下节论证),故又可据以校订延宝本之误,如延宝本第二页右半页第1行“《索引·本记》”之“记”应为“纪”,第2行小字注“自圣阳之德”应为“有圣明之德”。惜乎出土其少也。

另外,笔者曾在《两件新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残片考释》一文中谈及元代“蒙童习字本的大小及装订形制:……尺幅是20cm×14cm……与当今小学生32开练习本大小差不多(当然只能说有此一式,且似应为年龄较小者使用)……在右边栏装订……与彼时翻阅、书写从右到左的习惯相一致。”^② M1·1296、M1·1298尺幅分别为13.4cm×17.1cm、12.9cm×16.7cm^③(因残损关系,大者更接近原书纸页大小),与“20cm×14cm”近似,又可为前言元代蒙童习字本大小、装订形制之一证。

二、《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年代考

《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一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均未见收,国内失传,现存最早传本为日本延宝二年(1674)上田甚兵卫翻刻本,后又有日本元禄二年(1689)菱屋吉兵卫据此改刻之本^④。1934年,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史家、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编《善本影谱(甲戌)》曾披露延宝本书影并加以介绍^⑤,国人乃知有此一书。其后长泽氏更于1976年编成6大本《和刻本类书集成》,由东京汲古书院刊出,其第3辑收入是书^⑥,世人乃得睹其全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之影印出版(即笔者所据之本),然仅印1200册,亦不多见。《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不著撰人,历代目录著作亦率不载,固无从考知作者,成书年代亦有争议:酒井忠夫视其为明代“故事关系

①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0页。

②邱志诚:《两件新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残片考释》,《西夏学》第6辑,2010年,第99页。

③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8册),第1616、1617页。按:M1·1298四边线均较齐整,M1·1296至少下边线有缺损,故至少M1·1298之长应大于M1·1296,且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09页)的标注为“165×130毫米”(M1·1296)、“170×130毫米”(M1·1298),与此判断合,故笔者颇疑《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混淆了两残页的数据,似应对调才对。

④(日)长泽规矩也:《解题》,《和刻本类书集成》(第3辑),第4页。

⑤(日)长泽规矩也编:《善本影谱(甲戌)》,东京:日本书志学会,日本昭和九年(1934),第142-143页。

⑥《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从使用目的上看,为蒙学教材,自属蒙书;从编纂体例上看,类编历代君臣故事,则为类书,故长泽规矩也收之入《和刻本类书集成》。

的日用类书”中的一种,认为此类类书是为了经学、科举考试、童蒙教育及教化下层之用而编成的^①。长泽规矩也指出延宝本“渊源或为元刊本”^②,换言之,则以《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在元代或元代以前。学者或各择一说,或依旧存疑^③,未有定论。

从版本特征看,延宝本为两截版,上截刻插图,下截刻文字。上截版心刻有“故事”2字;下截版心单鱼尾下刻有“句解卷之×”字样(前4页仅“句解”2字),中部刻有页码。我们知道,虽然插图本起源甚早,但象延宝本《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这样每页都有插图的全相本最早见于元建阳本。尽管入明后这种全相本极为少见,但到明晚期万历(1573-1620)以后建阳书坊大量刊刻章回小说时又兴盛起来了。所以,尽管延宝本祖本是元刊本的可能性更大,但也有可能翻刻自明版——这正是酒井氏、长泽氏分歧原因所在——《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初刻在元、明,成书未必即在元、明,只能说该书成于元、明或元、明以前。笔者下文论证《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必在元代。

《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全书计3卷,分君道门、臣事门、儒术门、人伦门、官制门、人事门6门。臣事门分属卷上、卷中,人伦门分属卷中、卷下。所记内容起自盘古、女娲之世,迄于宋代。书中所记宋事颇多,为清眉目,列为下表:

序号	标题	内容	所记来源	卷次、页码
1	“生有神光”	记太祖事	“宋朝长编”	卷1、p210
2	“危竿之谕”	记仁宗事	“宋长编”	卷1、p210
3	“欹器之谕”	记仁宗事	“同前”	卷1、p210
4	“酌酒自经”	记刘翰被金人俘后自经事	“出行行录”	卷1、p215
5	“赵扑琴鹤”	记赵扑单骑入蜀事	“言行录”	卷1、p217
6	“曹彬图书”	记曹彬事	未标所自出	卷1、p217
7	“刀活冤囚”	记周敦颐事	“渊源录”	卷2、p218
8	“学大侍郎”	记赵师舜媚韩侂胄事	“庆元党禁”	卷2、p221
9	“家法之严”	记韩亿教子事	“苏氏谈(训) [训]”	卷2、p227
10	“救儿堕水”	记司马光幼年事	“闻见录”	卷3、p230

①(日)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东京:国土社,1958年,第120~124页。

②(日)长泽规矩也:《解题》,《和刻本类书集成》(第3辑),第4页。又,长泽氏仅在《解题》中用一句话提出了他的观点而未论证,前揭酒井文及其另一书《中国日用类书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2011年)亦未详论。

③如贾慧如认为虽“不能排除此书为元代类书的可能”,但仍将之排除在“现存元代类书”、“散佚不存的元代类书”两类外而归入“存疑”一类(《元代类书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7期,第53-57页)。

11	“指母堕钗”	记程颢幼年事	未标所自出	卷3、p230
12	“作相须读书”	记太祖事	“刘真如诗话”	卷3、p231
13	“除官不用例”	记寇准事	“言行录”	卷3、p231
14	“王氏三槐”	记王祐事	未标所自出	卷3、p238
15	“戒取佛首”	记程颢事	“闻见录”	卷3、p240

比较表中诸事，“学犬侍郎”所记时代最晚：

韩侂胄^{侂，拆；胄，赵又反}，尝与众客饮南园，过山庄，指其竹篱茅舍曰：“此真田野间气家[象]^{谓竹篱茅舍也}，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但少鸡鸣犬吠}。”少焉，有犬噪于丛薄之下^{须刻间有大声，声在荆棘丛生之中。噪，豪[豪]}。亟遣视之，京尹赵侍郎师霁也^{遣人观看，乃守京都姓赵名师霁。为侍郎者也。霁羊益反。}。侂胄大笑。诸生为诗诮之^{讥，诮[诮，讥]}，有“也曾学犬吠山庄”之句。其无耻也如此^{谓赵之为佞[极]无廉耻也。}。

所引《庆元党禁》的原文是：

丁巳秋冬之间，有献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遗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辈不堪戴耶！”侂胄患之。赵师霁时以列卿守临安，微闻其事。侂胄入朝未归，京尹忽遣人致馈。启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归，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来致谢，遂已。翌日，都市行灯，群婢皆顶珠冠而出。明日语侂胄曰：“我曹夜来过朝天门，都人聚观，直是喝采。郡王奈何不与赵大卿转官耶？”翌日又言之。于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胄尝与众客饮南园，过山庄，指其竹篱茅舍曰：“此真田野间气象，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少焉，有犬噪于丛薄之下，亟遣视之，京尹赵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后，师霁坐他事罢官。诸生为诗诮之，有“也曾学犬吠山庄”之句，指此也。^①

此“丁巳”年，为宁宗庆元三年（1197），因韩侂胄掌权至被史弥远谋杀期间只此一丁巳年。赵师送珠冠在是年“秋冬之间”，因之而有“工部侍郎之命”，时在“正月十八日也”，则此“正月十八日”已属“丁巳”次年。赵师霁学犬吠人称其“京尹赵侍郎”，此称必在其庆元四年（1198）正月十八日获任工部侍郎之后，据此可知《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必在这一时间之后。《图像合璧

①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4页。《宋史·韩侂胄传》所记事实同但不计时日（中华书局，1977年，第8749页）。

君臣故事句解》所引诸书也以此条出典《庆元党禁》一书为最晚^①。《庆元党禁》不著撰人名氏,卷首自序仅署曰“淳祐乙巳至日沧洲樵川樵叟”^②,《四库全书总目》据此推断为《庆元党禁》“作于宋理宗十八年”^③,说误,淳祐乙巳年是淳祐五年(1245),理宗在位已21年而非18年。据此,可进一步推定《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必在淳祐五年之后,其时距入元仅34年。

再从避讳来看,《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生有神光”条“(后唐天成三年)太祖生于洛阳大内夹马营”后小字注云“宋太祖皇帝生于洛阳之大内夹马营中”、“危竿之谕”条“仁宗”后小字注云“姓赵讳祯真宗子宋第四朝皇帝”、“作相须读书”条“太祖”后小字注云“宋艺祖”、“除官不用例”条“寇准在位”后小字注云“姓寇名准谥莱公宋仁宗朝宰相也”、“王氏三槐”条“王祐事太祖”后小字注云“姓王名祐事宋艺祖”——言“太祖”注云“宋太祖”、“宋艺祖”,言仁宗注其姓赵名祯而不讳,诸注语显皆异代口吻,则《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作于元代或元代以后必矣。这与前文据版本特征判断《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在元、明或元、明以前的结论是不矛盾的,二者的交集是元、明,换言之《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必在元、明。如果没有其他新材料,对于《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年代的探讨则不得止步于此。而当我们考辨出黑水城出土的M1·1296、M1·1298号文书是《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的抄本残叶时,这两件文书就成了我们需要的“新材料”:前已言M1·1296、M1·1298属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至北元宣光元年(1371)间遗物,则其所抄原本只能是元刊本而不可能是明刊本。根据《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在国内的失传及历代目录阙载的情况看,本书极可能元刊之后再无翻刻;又以蒙书之故,习者多不存藏,元后遂渐绝佚——延宝本的祖本亦必为此元刊本(且极有可能元时即被携至东瀛)。现既确知《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在元代已有刊本行世,上文又已证《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成书在元、明两代,则其书之作便绝无可能在明代而只能是在元代。悬而未决的酒井氏、长泽氏关于本书成书年代之争遂得定讞。

①诸引书惟“作相须读书”条出典《刘真如诗话》无考,李裕民《宋代诗话编年考证》一文以为伪作(《宋史考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按: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李裕民前揭文误作《三朝名臣言行录》,第292页)卷1所引文字与此条全同——《宋史·太祖本纪三》所记事实同而文字与此则大异——说明两书系自同一书中引出。而《五朝名臣言行录》注云出“《刘贡父诗话》”,则“刘真如诗话”为“刘贡父诗话”之误。又四库本《事实类苑》卷19“歌舞”条注云典出《刘真之诗话》,李裕民考“真之”乃“贡父”之误(前揭文,第291-292页)亦可佐证:“贡父”既可误为“真之”,也可误为“真如”——草书“父”字既易误识为草书“之”字,也易误识为草书“如”字。刘敞为北宋人,所著自早于《庆元党禁》一书。

②樵川樵叟:《庆元党禁》,第1页。

③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521页。

三、元刻本《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的刊刻地与流传

延宝本目录后自上而下排列有钟形“推(长泽氏释为‘椎’^①)善书堂”、圆形“四明杨氏”、鼎形“伯肇”牌记,虽均无考,不能据以断代,但由此可知延宝本祖本元刊本亦即 M1·1296、M1·1298 所抄之本乃四明杨氏“推善书堂”所刻。四明是今宁波的别称,这是否说明元本《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刻书地是在浙江呢?笔者以为,虽刻书者自称“四明杨氏”,刊刻地却不一定在四明而更可能在建阳,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如前文指出,全相本最早见于元建本且建本中最流行,如著名的全相平话五种等都是元建本。二是元浙本有牌记者较少,元建本则多有牌记且花式繁多。三是此本多所错讹抵牾,如目录前后标书名为“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而上卷卷首却标书名为“图像合璧句解君臣故事”——今之学者各从其引故而小异;上卷卷首有大字标题,中卷、下卷却没有;目录分卷为“卷之上”、“卷之中”、“卷之下”,版心却刻“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条目下标注出典,有的仅标书名“xx”,有的又标“出xx”,有的又不标;即或为同一书,书名也不统一,如“生有神光”条云出自“宋朝长编”、“危竿之谕”条又作“宋长编”;脱、衍、错字亦多,如误“本纪”之“纪”为“记”、误《苏氏谈训》之“训”为“訓”等,而粗陋讹误正是元建本此类书籍的一大缺点。那么,建阳刻书者何以要标称自己源出“四明”呢?一则此乃国人安土重迁情感经古代门阀政治再塑形成的一种署名习惯^②;而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标榜自己书堂源出宋浙本刻印精美,以广招徕,这在元建本中并不鲜见,很多冠有“古杭新刊”、“古杭新刊的本”字样的书籍^③也都是为了和宋浙本拉上关系,并非真是在杭州刊刻的。

M1·1296、M1·1298 号文书是元建本《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抄本残页的这一发现,表明当时刊刻于建阳的书籍流通到了直线距离 2000 多公里之外的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并且这种书籍是蒙学教材,有一定数量的蒙童使用当可肯定。换言之,《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在亦集乃路的流通与其在日本的传播不同——延宝本的祖本可能是使华或旅华日人顺便带回日本的,而流通到亦集乃路的《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则说明了建阳作为元代刻书中心的巨大市场辐射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籍作为商品,在元代就已经有一个全国性市场流通体系存在。

①(日)长泽规矩也:《解题》,《和刻本类书集成》(第3辑),第4页。

②如韩愈每署“昌黎韩愈”,至近人仍踵此习,如章太炎、梁启超每署“余杭章炳麟”、“新会梁启超”之类。

③如元建本杂剧《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等,参见:《古今杂剧》,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集部)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反过来讲,建阳所刻蒙学教材既已远销元帝国边疆地区亦集乃路,可见其吸纳全国书籍购买力的能力相当大,加上当时另两个中心杭州(今浙江杭州)、临汾(今山西临汾)所占的市场份额,则余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再支撑起类似规模的刻书中心,这极可能是元建立后未再形成新的刻书中心的深层原因。因为元建立后并非没有建立新刻书中心的打算:至元十年(1273)在大都设立了兴文署“掌雕印文书”^①即可为证。但其立而废、废而复立^②,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与浙、建、临汾并驾齐驱的新出版中心。对此,黄永年怀疑是因为“兴文署可能官商气重”而刻印很少^③,黄先生的解释恐非确诂。

这从宋金出版史上也可得到证明:北宋有杭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建阳3个出版中心^④。金人立国,平阳府临汾崛起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南宋方面,建阳更为兴盛而眉山则在走向衰落,无法与建阳、杭州相提并论了,等于“眉山这个中心不复存在了……南方的刻书中心就只剩下杭州和建阳”^⑤——金占中原,北宋一部分人口留在北方,南宋人口减少,社会对书籍的购买力下降,所以眉山在北宋末南宋初迅即走向衰落;原北宋留在北方的人口仍对书籍有消费需求,而两国对立,禁止书籍互市^⑥,所以就有临汾之崛起——临汾的崛起相当于把眉山这个中心移到了临汾而已,等于说南宋、金时仍然只有3个刻书中心而没有增加新的刻书中心。

作者工作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①王世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

②纪昀等:《续文献通考》卷141,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056页。

③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2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④北宋国子监校刻经籍虽多(称监本),但多送至杭州刊刻,刊刻地并不是都城开封(详参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62~63页)。又,有学者因北宋建本不传遂认为北宋建阳刻书情况不明(实际上北宋监本也几乎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关于建阳“麻沙本”校勘不精的笑话北宋时即广为流传——“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朱彧:《萍洲可谈》卷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7亦记其事)——《清实录》卷975亦载军机处覆奏乾隆,按照所传族谱,建阳书坊中最有名的余氏勤有堂北宋时即在建阳刊书为业,这些事实皆说明了北宋时建阳的刻书情况。(详参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72~73页)。

⑤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93页。

⑥参见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1945年,第95~112页;王德朋:《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书禁问题》,《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期,第75~76页。当然,虽有禁令,也不可能绝对禁止,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8~163页)讨论了这一问题。